

何其芳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何其芳文集(第三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220,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¹/₃₂ 印张 10¹/₈ 插页 3

1983年3月北京第1版 1983年3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书号 10019·3399

定价 0.95 元

目 次

散文、杂文

一九四七年

吴玉章同志革命故事	3
最早的爱国思想	3
戊戌新政的宣传者	4
君主立宪思想的改变	4
准备黄花岗起义	6
荣县起义	7
内江起义	9
反对袁世凯	10
加入共产党	11
创办中法学校	13
筹备国民党二次代表大会	15
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	16
大革命失败	18
在苏联	20
自我批评精神	22
抗战后作国际宣传工作	23
整风运动	25

被迫撤离重庆	25
七十岁	29

一九四九年

《星火集续编》后记一	31
------------------	----

一九五一年

《夜歌和白天的歌》重印题记	34
---------------------	----

一九五六年

《何其芳散文选集》序	36
------------------	----

一九七七年

毛泽东之歌	39
回忆周恩来同志	136
幸福的回忆	149
回忆朱总司令	154

小说、戏剧

一九三二年

王子猷	177
-----------	-----

一九三三年

夏夜	189
----------	-----

一九三六年

蚁	206
棕榈树	211
迟暮的花(欧阳先生的演讲)	225
欧阳露	233

一九七二年

长篇小说(未完稿)	243
-----------------	-----

散 文、杂 文

一九四七年

吴玉章同志革命故事

最早的爱国思想

吴玉章同志的二哥吴永铨，服膺宋人理学，是一个讲究气节的人。幼年，吴玉章同志和他共灯夜读《通鉴辑览》，读到南宋衰亡史实，就联想到当时中国的危局，好象亡国之痛就在眼前。他们把文天祥的《正气歌》和《诀命词》贴在墙上诵读。他们尤其喜欢读明末黄淳耀所作的一篇时文，“见义不为，无勇也”。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吴玉章同志说他永远都记得：“一则放之须臾，而已与草木同腐矣；一则忍之须臾，而已与日月争光矣。”这是说忠奸之分就在那临危授命的一刹那间。吴玉章同志的二哥又把黄淳耀的事迹写在那文章的后面。满清军队攻破嘉定城时，黄淳耀先叫他的妻子、弟弟上吊，然后说：“兄弟，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他也就从容自缢而死。吴玉章同志读着他的文章，又很感动于他的行动，自己也就想做一个节义之士。

甲午战争失败的消息传来了。读着光绪求和的诏书，吴玉章同志就不禁落下泪来。

这是吴玉章同志最早的爱国思想。包含在旧道德形式之下的民族思想。这是一八九五年，这时他十七岁。

戊戌新政的宣传者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公开主张瓜分中国，因而变法维新运动高涨。吴玉章同志这时喜欢读的书刊是《时务报》、《万国公报》、《蜀学报》、《经世文》正续新各编、《天演论》和康有为、梁启超的言论。戊戌政变时，吴玉章同志在四川荣县乡下得到消息，就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到处宣传新政，劝人不要再作八股。人家觉得他们象疯狂了一样，称他们为“时务大家”。但因为有皇帝的诏书为根据，守旧的人只能在旁边叹气，说世道变了。一百天过去了，六君子被杀，新政被推翻，守旧的人这时就出来嘲笑他们了：“早说不对嘛，要杀头哩！”他们就 and 这些人吵，说不怕，并用谭嗣同拒绝到使馆避难，甘愿作第一个变法的流血者的故事来回答这些人的嘲笑。

当时附近各县的进步青年都团结在吴玉章同志的周围。后来他们到日本去留学，许多都成了同盟会的会员。

君主立宪思想的改变

一九〇三年，吴玉章同志和他的二哥到日本去留学。这时，邹容的《革命军》一书出来了，打出了革命的旗帜。留日学生所出的《浙江潮》、《江苏》等杂志上都有许多革命的文字。在这些之外，吴玉章同志又读了一些欧洲革命史和卢梭的《民约论》。于是他的思想为之一变，觉得推翻满清的革命主张是对的。不仅为光复汉族的国家应该革命，而且为争天赋人权也应该革命，法国大革命杀路易十六正与孟子说的“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

也”相合。

和吴玉章同志一道去日本的邓孝可是一个崇拜梁启超的人，在路上曾约他到日本后同去见梁。到后，吴玉章同志思想改变，不愿去了，而邓却真到横滨拜梁为师，成了梁的信徒。

当时的读书人多看不起孙中山，说他没有念过书，不识字。满清政府通缉他把他的“文”字旁边加三点水，以表示是海寇。邓孝可就是这一类读书人，因此宁愿崇拜梁启超，而不能接受孙中山的主张。然而吴玉章同志和另外一些青年却成了当时的最激进的革命派。一九〇五年孙中山到东京后，他们就和他一起组织了革命同盟会。

一九〇五年，当时留日学生反对“取缔规则”运动失败后，情绪有些消沉，一个团结学生的群众组织“留学生会馆”竟至无人过问。“留学生会馆”是当时留日学生集会的地方，日本政府承认一合法机关，包括所有留日学生在内，又类似学生会一样的群众组织。吴玉章同志却一人支持了九个多月，终于感动了他们，大家才重又热心起来，恢复了集会。

一九〇七年以后，到处起义失败，当时灰心失望以至变节求个人出路的很不少，以至东京留学生中剩下的革命者竟寥寥可数。吴玉章同志却因此更加坚定振奋，把四川的同盟会员鼓舞起来，以团结各省的革命者。当时他主办《四川杂志》，章太炎主办《民报》。《民报》经费困难，常至断炊。吴玉章同志在四川会员中捐了许多钱去支持《民报》。

一九〇八年，《四川杂志》与《民报》同时被封，吴玉章同志并被判半年徒刑。因为是学生，结果缓期执行。

准备黄花岗起义

一九一〇年，吴玉章同志到香港。这时黄兴、胡汉民、喻云纪、林时爽等正在香港一面实验炸弹，一面商议广州起义。吴玉章同志参加了这次有名的黄花岗起义的策划，他负担的准备工作是回日本去购运军火。

吴玉章同志对这一任务完成得很好。每次军火装箱，他都亲手料理。后来运出了三四批以后，因为太忙，就叫另外一个人替他装。这个人把一百二十支手枪装在一个长不到三尺，厚不过几寸的皮箱里，看起来箱子不大，而提起来却重得几乎要使人跌倒。这样火车站上的人就怀疑了，故意将交通牌子弄错。因为牌子错了，运到横滨后要说明箱内的东西是什么，并打开来看，如果符合，才能领取。但这是一箱子军火，如何打开看得？果然，运到横滨后这只箱子就被扣住了。吴玉章同志得到横滨来的电报后异常着急。因为箱子上写明了运香港，如果事情暴露，前几批运出的还在海船上的几箱军火都会被没收；而且报纸上一张扬，广州起义计划也将被破坏。他立刻坐火车到横滨去。想了许多方法，花了整天整夜的时间，他终于把那只箱子取出来了。最初，他买了一个和它大小颜色都相同的箱子，里面也装了一些沉重的书籍钟表之类；然后去找领事馆的一个秘书写信，说把箱子取出即存于领事馆；如果能将箱子取出，则在途中偷偷把它掉换。但是，那个秘书正开始写信时却碰到领事出来了，不让写。实在没有办法了，吴玉章同志就冒险自己跑到车站上去。这时其他行李都领取光了，就还只剩下那一个箱子，一个日本人在看守着。这已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吴玉章同志就和他直接交涉，

说箱子是朋友的，钥匙早带走了，实在没有办法打开，要他通融。和他交涉了许久，后来发现他的态度不是很严格，吴玉章同志就一边和他说好话，一边就大胆把那个箱子提起，径自走出来了。

当他回到东京时，宫崎寅藏一家人都高兴得了不得。宫崎别号“白浪滔天”，是日本当时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中国革命同盟会的人买军火，都是由他介绍和日本军火商秘密进行的。他怕这事暴露累及于他，一家人都正在惶恐中，把他们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些秘密东西都放在他太太的背袋里，背在背上。所以吴玉章同志成功归来，他一家人都惊异赞叹。

第二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作了大总统。宫崎夫人到南京来，见到孙中山就总是要说：“你不要忘记了吴永珊。”吴永珊是吴玉章同志当时在日本用的名字。

并不是所有的同盟会会员都象吴玉章同志这样勇敢，这样忠实于革命的任务的。就是这次运军火回国的头一批，由一个叫周来苏的会员在一只美国海船上押运。船已经由横滨出发了，黄兴却从香港来了电报，说这只船到时恐怕要被检查，不宜搭。吴玉章同志赶快派人坐火车追去通知这位姓周的会员，要他注意，并多给他几百元以资应付，嘱咐他不要怕。这位先生结果怎样办呢？他就在船开行后把房舱的门关起来，打开窗子，取出箱子里的军火，一只一只地丢到海里去。他到香港后，黄兴和另外一些同盟会的人都气坏了，于是他就得到了一个绰号：“周丢海”。

荣 县 起 义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吴玉章同志又流亡日本。不久，四川的

铁路风潮起来了，同盟会派他回四川工作。一九一一年六月，他到了宜昌，感到人民已很有不安于现状的情绪，言谈间对黄花岗起义的失败表示惋惜。七月，他到重庆，见着谢持等，知道成都已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市民捧光绪牌位向总督赵尔丰请愿，要赵代请政府收回铁路国有的成命，竟被赵的卫队开枪打死了许多人。他第二天即从重庆回到他的家乡荣县去。沿途见各城镇都供着光绪的牌位，两边写着一副对联：“铁路准其民有，庶政归诸舆论”。这是当时已经死去的光绪的上谕中的两句话，用来表示铁路国有是违反了光绪的意思。满街都挂着黄布，仿佛象皇帝死了时一样，行人都要下马下轿才准过去。初看很觉滑稽，但这却是当时保路同志会的一种斗争方式。当时保路同志会有很多立宪党人，如邓孝可、张澜、罗纶等。保路同志会是当时革命政治派别的大联合，其中有同盟会，有立宪党，有哥老会。一九〇八年，吴玉章同志因各地起义纷纷失败，感到要有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才能成功，就和湖北的孙武，湖南的焦连峰，广东的熊越山，四川的唐洁、张百祥和他的大哥吴匡时一起组织共进会，把各省的哥老会、孝友会、三合会等联合起来，照他们的山堂组织，仍以他们为各地领袖，而他们又公推吴匡时为坐堂大爷，吴玉章同志为管事。所以当时的哥老会也是在同盟会的影响之下的。

吴玉章同志到荣县城门口时，正碰着同盟会的两个会员龙鸣剑、王子湘率领数百武装民团去救援成都。因为当时保路同志会号召全省人民起来，集中成都与赵尔丰作武装斗争。龙鸣剑见着吴玉章同志非常高兴，他说：“你回来就有办法了。我们带队伍到前线去，一切前途大计望你细心筹划。”龙、王出发后，荣县地主兼高利贷的当铺老板郭慎之就打算约几个豪绅控告龙于县知事，诬称他劫夺公款。吴玉章同志知道了，马上就召集了

一个会议，给他以严重的打击，当场议决按租劝捐来帮助民军，并加紧训练各乡民团来作后备。

龙鸣剑在仁寿县秦皇寺与满清巡防军作战失利，到嘉定病死。王子湘率领民团回荣县，立刻请吴玉章同志商议举事。荣县县知事和郭慎之闻风逃走，于是荣县就宣布独立，成立革命政权。这是一九一一年旧历七月中旬，比武昌起义还早一个月。

不久进攻威远县城，当天就攻下了。又进攻自流井，遇满清大队巡防军顽固抵抗，未能攻下。旧历九月底，各地巡防军集中自流井，听说端方大军快逼近成都，人心就有些惊惶。而吴玉章同志却镇定地说服他们坚守荣县，并于旧历十月一日与吴庶咸轻骑赴内江，发动又一起义。

内 江 起 义

内江同盟会会员很多，又有黄花岗起义牺牲了的喻云纪的家庭可以掩护。旧历十月三日，吴玉章同志到内江，正碰到端方军队经过，得与军中同盟会会员见面，决定他们到资州后杀端方，吴玉章同志即于内江起义。五日，军队果在资州反正，端方被杀，内江知事也闻风逃去。六日晨，喻云纪父亲和当地同盟会会员召集群众大会于天后宫露天大戏台前，到数千人，吴玉章同志在台上宣布革命宗旨，主张建立革命政权，群众欢呼，声震屋瓦。当时群众一致选举吴玉章同志为行政部长，立刻入县公署办事。

在这以前三四天，成都新军中有一个同盟会会员夏之时当排长，趁奉令出发讨伐保路同志会的机会，于途中枪击连长林畏生，率一连兵士二百余人起义，直奔重庆。到后，得城内张培爵、杨庶堪、谢持、朱叔痴等的响应，于十月二日占领重庆，成立蜀军

政府，张培爵、夏之时为正副都督。十月八日，成都也成立了军政府，蒲殿俊、朱庆澜为正副都督。

反对袁世凯

辛亥革命后，同盟会就开始分化了。有的想实现欧美议会政治，有的主张无政府主义。章太炎高唱“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拥护黎元洪来反对孙中山。汪精卫受了袁世凯的收买，劝孙中山与袁议和。孙中山就妥协了。这种妥协正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民国二年四月，袁世凯暗杀了宋教仁，又不经国会同意就借了二万万五千万外债，并用钱收买议员。同时，他要取消国民党粤赣皖湘四省都督的消息也传说得很厉害。吴玉章同志这时就向孙中山建议，主张四都督联合通电反对袁世凯的违法，并声明在合法内阁未成立以前不能受违法政府的命令，这样来先发制人。孙中山赞成，而黄兴却不同意。等到袁世凯免四都督职的命令发表后，迟延了许久李烈钧才在湖口独立，以至师出无名，国民党的反袁战争不到三个月即完全失败。

这年四月，国会开幕时，袁世凯花了许多金钱来收买议员，以至国民党拥有大多数议员却不能选出一个议长。在选举斗争的过程中，国民党也用一些金钱来收买。吴玉章同志知道后非常反对。他向当时办这类事情的国民党人说：“我们的金钱没有袁世凯多；与其用钱收买而失败，不如不用一钱以保持正义。如果我们初行民主制度即用金钱收买议员，民主政治就根本垮台了。”他们不听吴玉章同志的话，结果花了二三十万，议长仍是没有争到。

这些，都可以看到吴玉章同志的见地高出于当时一般的国民党人之上。

国民党的几个都督反袁失败后，吴玉章同志仍在上海各处奔走，进行反对袁世凯的活动。袁世凯的机关报上说重庆熊克武起义是他策动的，于是袁就下令通缉他。许多国民党人都劝他出国，并为他办好手续，买好船票。吴玉章同志遂于一九一三年冬天去法国巴黎。

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死了。十月，吴玉章同志回国。回国后，又参加了一些当时的政治活动。但吴玉章同志日益明确地感到这些奔走、这些努力的没有结果。

加入共产党

毛泽东同志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与组织者。”吴玉章同志就是那许许多多摸索着救国救民的真理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之一。他曾经是一个热烈的变法维新运动的拥护者，但接触到当时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激进派思想，他很快地就抛弃了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成为一个热烈的同盟会的战士。他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成功，也经历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的学说还是不能救中国。吴玉章同志就不能不再摸索，再前进。

和当时另外一些中国的优秀人物一样，吴玉章同志终于找

到了真正能够解放中华民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他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以后，他的革命生活就展开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就成为一个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时候，他是当时最活跃最有魄力的革命家之一。

一九一九年初，吴玉章同志读到了一本日文的《过激派》（日本对布尔什维克的译名），他非常高兴。因为这本书解决了他三个多年头不能解决的问题：

第一，他感到中国直接从事生产的只有工人和农民，一般知识分子和另外许多社会上的人都不愿劳动，结果都市里就有了很多游手好闲的人。如何能使这些人绝迹？他常常想，但想不出办法来。而布尔什维克却主张“不作工，不得食”，这就解决了他的问题。

第二，他又常常感到中国的官僚政治腐败到了极点。辛亥革命以后，情形更坏，即使有一二好人也不能改变这种政治。这又怎么办？他常常想，也想不出办法来。而布尔什维克却主张必须粉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以新的国家机器，才能铲除一切污秽，这也解决了他的问题。

第三，一九〇三年他在日本读了辛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非常欢喜社会主义。辛亥革命后，他和李石曾等都欢喜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到法国后，又对于法国的合作主义也很有兴趣，认为是到社会主义之路。于是他常和李石曾说：“我们应该成立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来实行。”李石曾回答他：“无政府主义是不要组织的，只要从事教育，多感化一些人就好了。”他总是怀疑这样作到底有什么成效。而布尔什维克却要以革命职业家来组织坚强的，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党来改革旧社会，建立新